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

徐天闵 集注

熊礼汇 校点

根澹葉茂 實亦聲滋
山高水長 流風是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

徐天闵 集注

熊礼汇 校点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徐天闵集注;熊礼汇校点.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0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11706-8

I. 汉… II. ①徐… ②熊… III. 古典诗歌—五言诗—注释—中国
IV. 1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1559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支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h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2.5 字数:320千字 插页:4

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1706-8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 1963 年 11 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出版说明

本书原为徐天闵先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授课时所编讲义，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印行。现据此版本，经熊礼汇教授校点整理，纳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以资纪念。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徐天闵《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再版前言

熊礼汇

徐天闵先生(1890—1957)是近代诗人,著名学者。自1929年秋季到1957年4月逝世,除在安庆老家休假一年外,一直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他和文学院另一位先生刘永济都是研究、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且同为蜚声文坛的作家,因为徐长于诗,刘长于词,故有“徐诗刘词”之称。据说武汉大学招收的第一个外国研究生、英国人贾克森,就是仰慕徐先生的诗名,特意到文学院研习古代诗歌的。徐先生诗学造诣极高,常年讲授历代诗歌,所编讲义亦多,如《古今诗选》、《历代诗选》、《四唐诗选》、《宋诗选》皆是,又有《杜诗选》、《苏诗选》等。《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以下简称《集注》),即为先生“初任武大教授时所编讲义”(徐天闵1949年12月3日所写教学《简历》),初版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重庆商务印书馆。值此《集注》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再版之际,特述三事以为弁言。

一、作者编写《集注》的动机、背景和经过

徐先生编写《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的直接目的,是为古代诗歌教学提供讲义,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却隐含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五言诗艺术发展特点的动机和对汉魏六朝五言诗大家名篇艺术特色比较分析以凸显其美的用意。这从先生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月所写的《前言》即可看出。

《前言》中说:“(《集注》)盖十八年(1929)秋所选辑者。当时拟就渔阳山人(即王士禛 1654—1711)《古诗选》节取汉魏六朝五言诗,并

为笺注，穷一年之力，至谢玄晖而止。越年改授《古今诗选》，别撰讲义，而余所拟完成之《汉魏六朝五言诗笺注》，遂尔中辍，逮今十五年矣。”“乃为补笺其残缺，兼勘其误谬。析为三卷，定名为《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付诸排印。玄晖以下，难为补续矣。其诗中案语，与今日所见者大有径庭，亦不拟复加改窜，藉以保存少壮时渐历之心境，得以频频回顾而已。”《集注》始编于1929年而改定于1943年，而这两个年头都处于较为独特的学术背景中。

前一年头所处的学术背景，既有晋宋以来关于五言诗发生、成立时期及其原因和古诗十九首创作时间及其作者是谁等诸多问题争论的大背景，也有20世纪20年代关于上述问题争论的小背景。晋宋以来，研讨五言诗发生、成立及其相关问题，多与考辨古诗十九首作者、产生年代及苏李诗、班婕妤诗等作品的真伪联系在一起。刘勰即云：“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又云：“《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钟嵘亦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诗品序》）又云：“《古诗》，其源出于《国风》。……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桔柚垂华实’，亦为惊艳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乎！”（《诗品》上）可见在刘、钟以前，学者们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创作年代暨五言诗成立的时代，就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说法。有笼统地说五言诗成立于两汉的，也有说成立于西汉、东汉或建安时期的；对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确认，则从西汉的枚乘说到东汉的傅毅，说到建安时期的曹、王，有的甚至认为其作者是生活在从西汉到建安不同时段的多个人物。刘、钟以后，学界对五言诗成立时间以及古诗十九首作者、创作时代的看法，基本上和刘、钟以前相同。不单关于五言诗成立时间的说法未能统一，论及古诗十九首作者也是“疑不能明”，或谓“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沈德潜《说诗碎语》）。虽对个案旧说质疑或径作否定者多，而拿出“确凿证据”以独创

新说者少。因而学者言及上述问题，沿用陈说（包括后起的疑古之说和所谓“新说”）者亦为常事。即使虞世南《北堂书钞》将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宵会》中“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作为曹植诗句抄入书中，能启发人们思考十九首中是否杂有曹植诗，或哪些属于曹植诗作的问题，但此类思考并未深入下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五言诗成立时间的争论，应是前一年头（1929 年）所处的学术小背景。这场争论是从陈仲子 1924 年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苏李诗考证》引发的，之后参与讨论的学者有李步霄、朱偰、陈延杰、徐中舒、罗根泽、游国恩、张长弓、梁启超、戴静山、陶嘉根、古直、隋树森、胡怀琛、杨向时、黄侃、范文澜以及日本人铃木虎雄等。讨论的结果主要有西汉说和建安说两种，前以朱偰、黄侃、范文澜为代表，认为五言诗在西汉前期已经成熟；后以徐中舒为代表，认为“不但西汉人的五言全是伪话，连东汉的五言诗，仍有大部分不能令人相信”，“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时代”（《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东方杂志》24 卷 18 期）。显然，两说在刘、钟之前已经存在，其说及刘、钟前后学者们对一些五言诗名篇作者、写作时间的看法，仍为学界普遍认同的看法。后来梁启超在其《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提出：“（东汉）安、顺、桓、灵以后……其时五言体制已经通行，造诣已经纯熟，非常杰出，理合应时出现。我据此中消息以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 120 至 170 约五十年间，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所以风格和建安体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钟仲伟且疑为曹、王所制也。”其说虽然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对 20 年代以后直至 21 世纪文学史的研究深有影响（论者以为：“现在流行的十九首‘东汉说’的说法，首先由梁启超根据其‘直觉’提出，罗根泽响应之，以后经过刘大杰、马茂元和游国恩等人的补充，遂流行至今。当今流行的几种文学史版本，仍然沿袭旧说，未能有所突破。”傅璇琮《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序言，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但在 20 年代，也只是一家之说，并非学者们研究五言诗或古诗十九首的共识。总之，

20年代仍是五言诗(包括古诗十九首)研究诸说并存、一切都在探索之中的学术时代。无疑,晋宋以来五言诗及古诗十九首学术研究的大背景,和20世纪20年代五言诗及古诗十九首学术研究的小背景,促成了《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的产生,徐先生博采众说以说五言古诗,实际上是用选本集注形式,通过对多家说法的评析,参与五言诗及古诗十九首诸多问题的讨论。

后一年头(1943年)处于抗战时期,先生正在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他在乐山仍为诸生讲授古代诗歌,专题课则以讲杜甫诗歌为主,所谓“到武大后,杜诗、苏诗隔年轮流讲授,抗战时专讲杜诗”(《教学简历》)。为什么十五年后又对《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重加修订呢?这与抗战时期流亡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弘毅、自强的校风和浓厚的学术空气分不开。武大和当时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并称民国四大名校,教学质量之高,在国内国外都享有盛誉。40年代中期,美国有关部门评估中国大学教学水准,即将武大列为全国第二,而英国牛津、剑桥大学不但承认武大学历,而且对武大毕业考试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的本科生,可以直接录取为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高,既要学生素质好,更离不开教授们学问的渊博和教学方法的得当。当年武大教授(多至120位)寄居乐山,教学环境恶劣(除设备简陋外,还频遭日寇轰炸)、生活艰苦(由于通货膨胀,有的教授一月薪水仅够半月开支),而科研未尝一日中断。除授课必编讲义外(大学教授的讲义多为其专著之雏形),还潜心研究新的课题,以论文和专著形式展现其成果。理科如邬保良从1939年就带领化学系教师开展对原子核理论的研究,连续两年在英国著名学术刊物《自然》上发表《原子核之形成》等多篇论文。高尚荫、公立华在1939年春天合写的论文《四川嘉定淡水水母之研究》,实为中国学者最早在无脊椎动物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又如武大游离层实验室最早就建立在乐山校址,乐山上空电离层的第一份正规的频高图,就是桂质廷观测描绘的。他如石声汉在一间由石砌望楼改造成的实验室从事植物生理及病理学、真菌学和农业科技的教学与研究,孙祥钟钻进深山老林作植物分类的调查,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雄心、韧劲,正反

映出战时武大“弘毅、自强”的校园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既激励武大师生奋进，也感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 1943 年、1944 年两次到中国考察科学和教育机构，每次参观、访问武大，都对师生的“巧思过人”、自强不息感佩不已。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一分册(植物学)扉页上，还特意记述当年考察武大科研、教学时与石声汉交往的故事。

和理科教授们一样，文科教授们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科研中，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如高亨修订完善《老子正诂》，是在乐山；撰写《周易古经今注》，也在乐山，前者 1943 年出版于开明书店。刘永济“屈赋学”、徐震研究《春秋》三传和韩愈、柳宗元古文的代表性著作，朱东润的《史记考索》和《张居正大传》，都是在乐山完成的。同在 1943 年，女教授苏雪林所作《屈原〈天问〉中的〈旧约·创世纪〉》，首揭屈赋和西方古文化联系的秘密；另一位女教授袁昌英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一个夏天就写出了十多万字的《法国文学》。而像朱光潜，除与方重合编《近代英国散文选》、《英国诗文研究集》外，还相继在 1943 年、1944 年发表、出版了《谈美感教育》、《谈修养》、《我与文学及其它》、《诗论》、《谈文学》以及《近代英美散文选》(与方重、戴镏铃合编)等。吴其昌除撰写《中国田制史》、《群史食货志校勘记》等专著外，还联系抗战形势写了《历代边政借鉴》、《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民族盛衰的关键和我们救国的态度》、《蛮族侵略历史性的比较》等现实性极强的史学论文。尤其令人扼腕的是，这位申言“战士死在疆场，教授要死在讲堂”的学者，写《梁启超传》，“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吴其昌《致潘公展、印维廉书》)，及至书稿(上册)完成一月之后，即溘然长逝，死时年仅四十！战时武大学生研究学术的热情亦高，其学术活动多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如方壮猷为宋史专家，著有《中国史学概要》、《宋元经济史稿》、《宋三百年学术年谱》等。从 1939 年就组织史学系孙秉莹等四位学生参加《宋史》的整理工作，师生用了五年时间才编好《宋史类编》(1944 年交重庆正中书局出版)。以上只是战时武大科研之大概，还未言及他们写作诗词、散文(包括杂文、小品)、戏剧、小说的情况。应该承认，战时武大学

术气氛之浓厚、教授们学术研究之执著、师生们写作之勤奋，对每个有研究能力、创作激情的人，都有一种引发其思、激励其行的作用。徐天闵先生本是勤于著述的学者、敏于创作的诗人，身处武大其时其地，自会顺其潮流而动。也许，这也是40年代的徐先生，何以一面即兴为诗，一面又认真修订《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以求面世的外部原因。

二、《集注》的编撰特点及其学术意义

《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所选五言诗共189首，均取自王士禛所编《古诗选》。除《古诗十九首》、《陌上桑》、《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西洲曲》外，另167首分属28位诗人。除“无名氏”《古诗十九首》全数入选外，知名作者入选10首以上的，计有曹植13首，阮籍20首，陶潜50首，谢灵运30首，鲍照29首。在徐先生以前，用“集注”形式解一组诗或一家之诗（众体之诗）是有的，但用“集注”形式解历代同一体裁之诗似乎很少见，因而该书体例暨研究诗学的书写策略是有新意的。该书“集注”文字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诗歌字、词、句及典故的注释，二是对诗歌写作时间、地点暨背景的说明，三是对诗歌主旨的揭示和对艺术特色的分析。行文都是先注后评。对大家、名家，有的会在作者简介或评论所选最后一首诗时，总论其诗风特色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甚或逐一介绍其诗及一家诗风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集注》选用了钟嵘、李善、沈德潜、何焯、陈祚明、曾国藩、方东树、陈沆、吴汝纶、刘履、蒋师爚、黄节、吴兆宜、何孟春、李公焕、陶澍、古直、黄文焕、闻人倓、朱止谿、朱桓堂、朱兰坡、吴淇、汤东涧、顾皓、陈倩父、方虚谷、胡枕泉、张荫嘉、成倬云等七八十位诗论家的说法，所“集”注家之多，亦属少见。编者将诸多说法“集”在一起，对解说问题自有相互补充、相互比较的作用，十分有利于读者独立思考，使之从多个角度把握诗的立意和领略诗的艺术美。

《集注》的学术性，主要表现在通过对汉魏晋宋五言诗的注解、评论，集中展示了历代诗论家研究汉魏晋宋五言诗的诸多见解；通过徐

先生对诸家看法的辨析，对许多说法的是非、正误作了某种程度的清理，而在辨析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因而了解其学术性，既不能忽略徐先生所引的诸家见解（见于每首诗的注解、评论），更要重视他做的辨析或径直提出的新见（见于经常出现在诸家注解、评论文字中的“天闵案”）。而后者尤能表现徐先生研究汉魏晋宋五言诗诸多问题的心得和用编写《集注》的形式参与五言诗学术讨论的用心。

不过，我们认识《集注》的学术意义，似应注意两点，一是《集注》产生的学术背景，二是“天闵案”立论的表述方式。前已言及，《集注》产生的学术背景，无论是晋宋以来五言诗和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大背景，还是 20 世纪 20 年代讨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有关问题的小背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许多问题（如五言诗成立的时间，苏李诗、班婕妤诗的真伪，十九首的作者、创作时代）的看法，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旧说即使见疑，仍有流行的空间。甚而有新见，也是在默认旧说的前提下产生的。至于对一首（或一组）诗、一家诗的看法，更是有同有异，自持己见者多。在这种背景下，要在学术上有重大突破是很困难的，加上《集注》毕竟只是一个详注集评的诗歌选本，涉及的学术问题具体而微，多而零散，故有突破也是局部性的，这不能不对《集注》的学术意义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书中“天闵案”的内容除少数是说明情况外，多数都是表达徐先生对所引诸家注解、评论的看法，有些是直接提出自己的新见，自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有的是响应、附和他人之说，或径作肯定，或作补充以申其说；有的是径作否定，或引事论理以言其非。应该承认，后二者也是一种学术贡献，是一种表述方式比较特别的贡献，它们既能显现徐先生的学识，也能表现他的胆识，同样是有学术意义的。

徐天闵先生室号信斋，他在其他诗歌选本中径称其论诗文字为《信斋诗话》。《集注》内众多“天闵案”中的案语，亦可视为《信斋诗话》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诗论观念和研究五言诗的心得。

这里不妨分类拈举案语略作分析，以见其要义及表述方法。

（一）对诗歌批评方法的批评。徐先生长年从事诗歌研究，自有一套研究方法和路数，其方法、路数的形成，与他对诗歌文学特性、美

学意义、艺术形式的体认大有关系，这从他对五言诗批评方法的批评亦可看出。如他说：“《古诗》有本事可考者详为考证以释诗，自较亲切有味。若疑莫能明，妄为傅会，捕风捉影，大类痴人说梦。诗有因注而转晦者，此类是也。两汉去《风》、《骚》未远，诗多比兴，温厚典则，莫之与京。贤士大夫或不得志，君臣朋友往往托物引类，发兴无端，然亦实有室思之作、弃妇之篇。若视为寄托，则诗意荒芜。要当静求文理，一扫拘牵，庶能以意逆志、心领神释也。（读阮公《咏怀诗》，尤须注意此旨。）”徐先生认为诗有有寄托者，也有直抒情感、别无寄托者。对本事清楚的诗歌，是赞成结合本事弄清诗的立意的。但对“本事（包括作者）”“疑莫能明”的《古诗》，却不赞成对其“本事”胡乱猜测，以求其“寄托”所在，说那样就会使得“诗意荒芜”，即不能充分展现或领略诗意的美，造成诗意“因注而转晦”。正确的做法应是“静求文理，一扫拘牵”，“以意逆志，心领神释”。徐先生论诗深忌穿凿、附会之说，故“天阅案”中，评论他人注解，不乏“某说最为穿凿”、“此释穿凿特甚”、“此说尤为穿凿”，“某说亦凿”一类字句。甚至批评陈沆，一则谓“太初笺《游仙诗》，牵合事实过多，终嫌穿凿，窃未敢从，故悉不录”。一则谓“太初《诗比兴笺》用力颇勤，然过事穿凿，乖违本旨者正复不少，读者不可不知也”。徐先生反对论诗“过事穿凿”和批评一些人解诗“未免求之过深”一样，都是因为那样做会“乖违本旨”、远离本旨，以及忽略对诗美的领略。

徐先生对五言诗诗美的认识，大抵同钟嵘的论述一致。钟嵘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诗品序》）故其论诗，颇为重视对诗之“滋味”的体味，对诗歌“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艺术成因的探究。在这点上，和方东树有相似处，因而《集注》采用方氏《昭昧詹言》言论甚多。方氏说：“五言诗以汉魏为宗，用意古厚，气体高浑，盖去《三百篇》未远，虽不必尽贤人君子之词，而措意立言，未乖风雅。惟其兴寄遥深，文法高妙，后人不能尽识，往往昧其本解。”（《昭昧詹言》卷一）其解诗亦多用力于“兴寄遥深”之挖掘、“文法高妙”之剖析，多有精到之论。不过前者亦难免穿凿、附会，后者惯

用古文章法说诗之“文法”，充斥“文笔雄迈”、“章法奇绝”、“妙有章法”、“章法明整”、“句法高秀”一类评语。对其言之过头、罔顾诗味之美或误会其美者，徐先生并不赞同，他说方氏论陶渊明《饮酒·在昔曾远游》“仅以恐失固穷之名释之，殊少味矣”，足见其论诗对五言诗“滋味”之美的重视。而从他大量引入曾国藩批语“识度”、“气势”、“情韵”等，说明他认为此类古文之美也存在于五言诗中。由此更可看出，徐先生确实和方氏一样，论诗有诗文互通、将诗文打成一片的倾向。

(二)对诸家说法是非、高下的评判。所谓评判，实是对所引诸说正确与否的判断，对如何理解所引诸说起有指导作用。作为集众家之说的选本，有这种评判和没有这种评判是不一样的，而评判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见解的宣示，反映出评判者学术造诣的高下和鉴别能力。

考“天闵案”，徐先生的评判有径言其是或非的，也有略作辨析以作评判的。如引何孟春语道陶渊明经历，即频频插入“天闵案”云“此说非是”，“此说是也”。又如引刘履、方东树语解阮籍《咏怀·二妃游江滨》，“天闵案”云：“方说是也。”“刘氏云云，未得其旨。”引汤东磧语解陶渊明《饮酒·颜生称为仁》，“天闵案”云：“此解深得渊明之旨。”引吴汝纶语解陶渊明《拟古·荣荣窗下兰》，“天闵案”云：“吴氏所说甚精当。”引方东树语解阮籍《咏怀·昔年十四五》，“天闵案”云：“‘乃悟’二句，方谓乃悟为仙人所笑，非是。”他如说黄节“释（阮诗）‘揖让’二句，穿凿特甚”，说吴琪解阮诗“春秋非有托”，“此解颇为迂曲”，皆是直言其是或非。而像引众说解曹植《名都篇》，“天闵案”云：“郭茂倩《乐府诗集》谓此诗为刺时人，吴伯其谓借以写牢骚抑郁，以《美女》、《白马》两篇之意推之，则吴说近是，然而此篇尤深隐难识矣。”引沈约、沈德潜、徐经纶、黄节、方东树语解诗《灼灼隰日》，“天闵案”云：“徐、黄二氏所说，较方氏为优。”“黄未会归愚之情，仍取沈约之说，甚为无当。”引方东树语解陶渊明《游斜川》，“天闵案”云：“‘吾生行归休’，重在‘吾生’二字，方氏解作休官，迂谬难通。”引方东树“后半衍周公事太多，虽陈思有托而然，后人宜忌学之”解曹植《怨歌行》，“天闵案”云：“乐府体稍衍，似不为病。”引王世贞语论

曹植《赠白马王彪》，“天闵案”云：“此为当然两章，政不必以法《文王》之什而断其为二也。”引钟嵘《诗品》论张协诗，“天闵案”云：“景阳诗，与《十九首》为一派，但无空灵、矫健之致耳。”是为略说道理以辨析他人说法正误及全面与否者。书中也有同一种看法，或径言其非、或略加说明、或稍作辨析者。如方东树认为阮诗《平生少年时》、《嘉树下成蹊》、《昔闻东陵瓜》、《北里多奇舞》、《灼灼西隄日》，均有忧曹爽意，“天闵案”则一云：“方说亦凿。”二云：“方氏谓指曹爽，似未可据。”三云：“诸家所说，大略相同，惟方氏谓指曹爽，亦自可通。但细玩此诗意旨，实有亡国之惧，不仅区区为曹爽忧也。”四云：“方说谓指曹爽，仍嫌无据。”五云：“方说阮诗，多认为讽刺曹爽之作。按《晋书》本传，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此盖方氏所指证者。余谓嗣宗亲见魏祚将移，深为痛惜，不仅区区为曹爽忧也。”足见徐先生对所引诗论的评判，或是或非，用语虽简，却自有所见作为评判标准，偶尔概言一二，即能发人深思。

（三）对自得之见的陈述。从上举徐氏按语，已可看出他借评判他人诗论正误以表述自家诗论观点的趋向。实际上，撰写“天闵案”，正是徐先生陈述其研究汉魏晋宋五言诗心得的重要途径。徐氏所作按语，实可视为《集注》所“集”诸家诗论之一种，其学术分量之重，并不亚于所引他人之说。

“天闵案”借评判诸说以陈述己见，学术视野开阔，其说不单能言他人言说之未及，还能别创新说以深化人们的认识。如论王粲《咏史诗》主题，“天闵案”云：“此似与子建同时唱和之作，用意政同。五臣《注》谓：‘魏武好以己事诛杀贤良，故托言三良以讽。’盖仅就起四句而为之说，未得本诗之要旨也。诗意仍视殉死为当，‘人生’四句，即子建所谓‘忠义我所安’也。特子建别具苦心，故言之尤觉深痛，仲宣乃人臣客气语耳。方氏乃谓此篇较胜，似为失言。”再如引徐经纶、黄节语解阮籍《咏怀·夜中不能寐》，“天闵案”云：“黄说是也，然‘忧思’二字确为八十余篇之主宰。又此诗但写情景，不著议论，谓为发端，似无不可。或阮公总集所著，特题一首于其端耶。”又如引众说解

陶渊明《赠羊长史》，“天闵案”云：“陶公盖深痛神州陆沉，刘裕收复关、洛，本为经营中原绝好机会，特裕志在篡窃，无心于此，故借赠羊长史，一写其愤慨耳。注家向无有道及此者。”此类按语都是真有所见，非人云亦云之说。

徐先生说诗往往一语中的，如其解曹植《三良诗》“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为”，“天闵案”云：“功名由天，故曰不可为也；忠义可以自勉，故曰我所安也。”再如其引闻人倬、古直语解陶诗“客养千金躯”之“客养”，“天闵案”云：“‘客养’二字，闻氏、古氏所说均未惬。‘客养千金躯’，犹云有可养其千金之躯也。只须加一‘有’字，其意自明。”又如引陈祚明、方东树语细说鲍照《从登香炉峰》工拙之处，“天闵案”陈述已见，仅言：“此学康乐而不能得其精深华妙。明远所长，固不在此也。”言简意赅，可谓精当。此外，从“天闵案”中的自陈已见，还可看出徐先生领会诗情诗意之深细。如其解潘岳诗句“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谓：“收句言我之沉忧，庶几渐衰减，则犹可如庄生之箕踞鼓盆也，然而此恨绵绵无绝期矣。意最沉郁。”解鲍照诗句“适郢无东辕，还夏有西浮”，谓其乃鲍照“不乐此行（指从临海王之荆州）之表现”，言：“‘无东辕’，谓不能还都也；‘有西浮’，谓不之荆州势不可也。不似东坡之西望夏口、东望武昌，但写山川之形势也。”读此，不能不佩服徐先生深入细致体味诗歌“滋味”的功夫和敏锐的感悟能力。而读“天闵案”关于谢灵运三首石门诗中之“石门”应为嵯县之“石门”、鲍照《岐阳守风》之“岐阳”“决非今陕西之岐山县”的考证文字，则可知先生史地修养之深厚。正因为他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故其按语不乏卓见深识，其能切中肯綮，亦非“所说虽是，乃偶中，非真知耳”（引汤东磬语解陶诗“畴昔苦长饥”之“天闵案”）。

（四）对若干专题的详细论证。徐先生作按语，多因接触异常观点或典型材料而发。如其引陈沆解元好问“可惜并州刘越石”云云，即谓“此非遗山诗意，辨之如下”。而见陶渊明《饮酒》第十六首“行行向不惑”、第十九首“是时向立年”，即谓“此二诗乃为求陶公年岁重要材料，当详论于后”。上引按语亦有专题论证的，这里所谓“详细论证”者，是指形如论文的“天闵案”。此类按语，少则数百字，多则数千

字。如其对曹操《苦寒行》中“太行山”、“羊肠坂”地点的确认，对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原因的分析，都长达五百多字，而其论述“陶公归田之年，决为二十九岁”，“《饮酒》二十首，决为公三十九岁所作，且决为归田后作品”，更长达五千余字。他如讨论“陶集三大问题”之“甲子问题”（另两个问题是“侃后问题”、“年岁问题”），如果将其“所采众家之说”和他的按语都视为专题论文不可分割的部分，其文亦长达四千多字。就全书体例言，这些长篇按语自属异类，但其论述之专门化，涉及问题方面之多，征用材料之丰富，辨析逻辑之缜密，又非如此而不能成其事。于此亦可见出《集注》体例设置的原则，是以达意（或谓表达学术见解）为主，这大概也是该书能充分表述徐先生学术见解的原因之一吧。

总观《集注》之“天闵案”，所述学术观点皆因论诗而发。其论诗除用心体味诗之“滋味”外，还注意阐发诗的美学意义，使人觉得他的有些读诗感受颇有时代意识。像解王粲《七哀诗》之“天闵案”云：“盖汉末中原多故，匈奴、乌桓、鲜卑、氐羌诸族，侵袭边地，无人过问。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真惨痛也。然豺虎构患，天下滔滔，岂真有所谓乐土哉？卒至无可如何，而以蓼虫不知辛为解，用意尤为悲愤。”解陶渊明《赠羊长史》之“天闵案”云：“陶公盖深痛神州陆沉……起八句，言生逢叔末之世，读古人书，慨然想见黄、虞之盛，特今者中原沦于胡虏，不独黄、虞之不可逢，即圣贤遗迹之在中都者，欲一娱游心目而不可得也。用意何等沉郁！”读此类诗评，总会使人想起1943年前后日寇侵占中国的历史，隐约感受到流亡大学——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徐天闵先生心中的忧愤和不平。

三、读《集注》应了解五言诗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

《汉魏晋宋五言诗集注》，毕竟是一个始编于85年前、初版于70年前的五言诗选注本，纵然徐天闵先生在书中容纳了那个时代五言诗研究的众多学说和见解，表达了他个人研究五言诗的不少心得和有价值的看法，但由于时代的原因，它所集中展示的学术成果，对五言诗研究一些重大问题的突破，其作用是有限的。它基本上仍是一个按照